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現代小說中的孩童論述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0-2411-H-002-021-

執行期間：90年08月01日至92年01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梅家玲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2 年 5 月 5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 果  
報 告

期中進  
度 報 告

現代小說中的孩童論述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0-2411-H-002 -021-

執行期間： 90 年 8 月 1 日至 92 年 1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梅家玲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  
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 華 民 國 92 年 5 月 1 日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報告

## 現代小說中的孩童論述

Discourse of Children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計畫編號：NSC 90-2411-H-002-021

執行期限：90年8月1日至92年1月31日

### 中文摘要

兒童是民族幼苗，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其成長發展，往往攸關於新興國族的未來走向。新文學發展之初，魯迅即有「救救孩子」之說，而「孩子」在此後現代小說的敘事中，雖也佔有一席之地，卻未必受到研究者重視，是為現代文學研究中的一大缺憾。本計畫擬以「救救孩子」之說為問題意識起點，進而探討現代小說中的「孩童論述」。

所謂「孩童論述」，除了泛指一般「兒童」外，同時也涵括年齡上雖非幼童，身份上卻同於「救救孩子」說中的「孩子」。計畫將以小說文本為研究範圍，兼及小說家追憶童年的自傳性文字，以及其它論述性篇章。所謂的「孩童論述」，因此將不只是「孩童」在小說敘事中形象言行的分析，或成長歷程的觀照，更包括他們在成人社會中所被賦予的社會意識、階級認同、性別觀念、國族想像，以及其間繁複的辨證過程。

關鍵詞：現代小說；孩童論述；救救孩子。

## 英文摘要

Children are future masters of a n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s deeply related to a nation's future. A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ook shape, Lu Xun had reminded people to "save children". Later on, "Childre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Yet few researchers have emphasized it. It's an oversight in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project, therefore, aims to encompass issues concerning the "Discourse of Children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nd how to "save children" will be the starting point of my research.

The word "children" in "Discourse of Children" refers to kids and juveniles whose identities resemble that of Lu Xun's "children". This project will focus on modern fiction and the recollection of childhood as reflected in authors' biographies. On the one hand, "Discourse of Children" will analyze the characters of children and their experiences of growth depicted in fic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will explore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class identification, gender concept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endowed with children by adults. The dynamic dialectic process will be included as well.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fiction; Discourse of children; save children

# 目錄

(一) 前言

(二)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三) 文獻探討

(四) 研究方法

(五) 結果與討論

## （一）前言

兒童是民族幼苗，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其成長發展，往往攸關於新興國族的未來走向。新文學發展之初，魯迅即有「救救孩子」之說，並以爲「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而「孩子」在此後現代小說的敘事中，雖也佔有一席之地，卻未必受到研究者重視，是爲現代文學研究中的一大缺憾。本計畫擬以「救救孩子」之說爲問題意識起點，進而探討現代小說中的「孩童論述」。

此一研究計畫，基本上是前兩年「少年中國：中國現代小說中青少年成長／啓蒙論述與新國家論述初探（I）（II）」的延伸。根據前述研究，萌興於晚清的新文學／文化運動，主要目的，實係朝向一個「少年中國」的建構。因此，從一開始，代表了青春希望的「少年論述」便與「新國家論述」互爲表裡（參見該計畫成果論文：〈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啓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啓蒙論述與國族想像〉）。然而，當時的「少年論述」，固然不乏著眼於實際生理層面，指涉青春期的少年人物，但更多的，反而是作爲一種「修辭策略」的運用——也就是以之爲一切春青希望的代稱。正是如此，它具有高度的理想性格，而這理想性格，又必得要通過幼兒時期特定的教育啓蒙，方得以擺脫「修辭」層面，真正化爲社會文化的種種實踐行動。也因此，五四以來，除了「少年」意象仍被廣泛運用外，更有對「孩子」、「兒童」的特別關注。這一關注，是如何落實到文學／文化實踐之上？它是否，以及如何，對現代小說發展產生影響？而這同時關乎教育與啓蒙議題的論述及實踐，又是如何牽動彼時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的互動與位移？這些都是極爲重要的論題，但向來乏人深究，因此，我將以系列計畫方式，逐年就此予以探討。爲能正本清源，在這開始的第一年中，將集中處理魯迅與周作人的「孩童論述」。

## （二）研究背景與目的

初步考察晚清至五四的「孩童論述」，發現它至少體現爲以下三個方面：一，翻譯引進西方兒童觀及童話、少年小說，爲兒童編輯的刊物出現，以及國人自行創作的童話小說及時應運而生；二，對於孩童定位及兒童文學、教育啓蒙問題的討論，成爲彼時的熱門話題；三，在現代小說的創作方面，「孩童」也逐漸浮出歷史地表，頻頻成爲關注、被書寫的要角。所以如此，正是緣於時人對於新國家、新社會的殷切期盼。因此，由「少年論述」轉而擴展

到「孩童論述」的研究，當有其必要性。在此，所謂「孩童」，除了泛指一般「兒童」外，同時也涵括年齡上雖非幼童，身份上卻同於「救救孩子」說中的「孩子」。孩子在年齡層上固然不一定就是幼童，意義上卻可涵括後者。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救救孩子……」一九一八年，魯迅於《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為新文學樹立里程碑。文中「狂人」控訴中國五千年「吃人」歷史之餘，猶不忘「救救孩子」，悲愴的吶喊，曾撼動多少有識之士的心靈。誠然，孩子是成人世界的希望所繫，「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從晚清到五四，無論是梁啟超的〈論幼學〉、〈少年中國說〉；抑是魯迅的易「長者本位」為「幼者本位」、周作人的以「子孫崇拜」取代「祖先崇拜」，其終極關懷，無不是期盼長久積弱落伍於列強之後的中國，能經由「孩童」、「少年」等新生命的開始，振衰起弊，除舊布新，打造嶄新的國族未來。也因此，對於「少年」、「孩童」的發現與重新定位，實為彼時文學／文化論述最重要的突破之一。然而，梁啟超的「少年中國」之說，畢竟還只是傾向於將「少年」作為涵涉一切青春希望的修辭策略，所謂的「少年中國」，乃是一重新「自我命名」的召喚行動。至於「少年」是什麼？「中國」又是什麼？如何才能成就「少年中國」？一切內容，均有待多方去想像填充。魯迅、周作人及其後的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成員們，則汲取西方現代孩童觀念以建構本土性的中國孩童論述，不僅大力宣導兒童「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內外兩面的生活，兒童期的二十幾年的生活，一方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預備，但一面也自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周作人，〈兒童的文學〉)，更藉由大量翻譯外國童話、編輯出版兒童刊物，以及親身參予本土性童話創作等實際作為，以改造中國的孩童啟蒙教育。而這一切，似乎正是為「如何」救救孩子，做出具體貢獻。

但事實上，孩子果真被解救，或解放了嗎？不宜忽略的是，西方「孩童論述」的形成，乃是經由「從教育性到娛樂性，從教訓性到解放性」的階段進程發展而來；孩童得以自在自為，有其水到渠成的歷史因緣。五四論者戮力於現代性之追求，憂心國是，改革心切，一方面秉持「拿來主義」，強調「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倡議應理解、尊重孩童，順其自然發展，另一方面，卻因為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實況，完全不具備可以理解、尊重孩童自由發展的歷史條件，再加上「感時憂國」、「為人生而藝術」、「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等不同理念使然，讓「孩童」在實際的小說書寫中，成為各類意識型態相互角力的競技場，其自我建構的同時，早也有無可或免的自我解構，不請自來。首先，魯迅的「救救孩子」之說，原就是為了批判／改造「國民性」而發，背後實隱含一「拯救者(成人)／被拯救者(孩子)」的二元架構。當此一思維表現在小說中時，顯而

易見的是，《吶喊》中的孩童非病即死，曾是〈故鄉〉中的鄉土小英雄潤土，成人後還是得淒涼地呼喚昔日的玩伴為「老爺」，向既有的階級觀念俯首稱臣。到了《徬徨》，孩童則根本融入看客庸眾之中，成為其所欲批判的對象。

「拯救／被拯救」的二元架構，遂告瓦解。更有甚者，後來毛澤東延安文藝講話中，將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語中的「孺子」，解釋為「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為它提供了社會主義政治化詮釋。經由此一轉喻，原先的某些拯救者（成人中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在此則成為等待中的被拯救（或被服務？）者，原先的二元架構，遂為更複雜的身份位移所取代。「救救孩子」因而並不意謂著「解放」孩子，反而是在各種修辭策略的運作下，將其牢籠至由多重政治意圖與意識形態所交錯出的論述架構之中。循此開展出的「孩童論述」，其複雜矛盾性，由此可見。它所導出的問題，於是便不僅是「為何」救救孩子，也是要「如何」救救孩子；不僅是對孩子本身成長發展過程的多方觀照，更要思辨：在建構新社會／新國家論述的同時，「孩子」如何被挪移置換為「弱者」或「（未來）中國（人民）」的箇中曲折。而本計畫，正是試圖經由多方蒐集、閱讀相關資料，就其間的轉折遷變，做出細緻的論析。而為求正本清源，本年度的研究重點，將集中於處理魯迅與周作人的「孩童論述」。

### （三）文獻探討

儘管近年來有關現代小說與兒童文學的研究成果皆堪稱豐碩，但在現代小方面，以「孩童」作為研究主體者，迄今並未得見。在兒童文學方面，晚近大陸各地的「教育出版社」與「少年兒童出版社」雖已出版不少關於兒童文學的資料匯編及研究論著，學者也推崇新文學運動中，魯迅、周作人等對兒童文學的具體貢獻，並視其為兒童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先驅者，但所著眼者，僅在於他們的童話翻譯創作及相關論述，至於在他們的現代小說創作中，也曾大量出現的「孩童」書寫，則完全未曾觸及。因此，在直接與本計畫相關的研究成果付諸缺如的情形下，本計畫目前所能掌握的，多為原始資料，包括：

- 一， 二〇至四〇年代重要中國作家全集；
- 二， 晚清以迄四〇年代的重要報刊雜誌、各類重要外國童話及兒童

文學譯本；

這將是為據以爬梳研探的最重要依據。此外，間接的參考文獻，則包括以下幾類：

- 一，以夏志清《現代小說史》、陳平原·夏曉虹所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等為代表的文學史論與史料類；
- 二，以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為代表的現代文學研究論集，及相關的單篇論文類；
- 三，以蔣風、韓進《中國兒童文學史》、朱自強《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入理入情：明清幼學發展與兒童關懷之兩面性〉為代表的中國近代兒童論述相關研究；
- 四，以 Philippe Arie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為主的近世西方兒童論述研究，以及其它重要文學／文化理論；（詳參所附參考文獻）

其中，第一類可為本研究提供資料性的參考；第二類處理現代小說議題而不及於孩童論述；第三、四類雖處理孩童論述，但前者或僅及於兒童文學，或由史學角度切入，範圍落在中國明清，後者則屬西方論述，均未涉及現代小說的討論。此三者雖與本計畫並無直接關聯，但相互參照，適可為本計畫提供方法與觀點上的參考。而本計畫的特殊性亦將由此凸顯：在前無所承的情況下，能藉由其它領域、其它議題研究成果的相互激盪，為現代小說開發新的研究面向。

## 附錄：主要參考文獻

### 一. 原始資料

#### 1. 二零年代至四零年代重要中國作家集

《魯迅全集》／魯迅著。台北市：谷風，1989 {民 78}

《朝花夕拾》

《南腔北調集·上海的兒童》

《墳·我們現在怎樣作父親》

《墳·燈下漫筆》

《墳·娜拉走後怎樣》

《感時錄》

《熱風·與幼者》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圖》

《且介亭·難行和不信》  
《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  
《韜奮全集》／鄒韜奮著。上海市：上海人民，1995 {民 84}  
〈紀念兒童節與兒童保育運動〉  
〈怎樣喚醒落後的青年〉  
《郭沫若全集》／郭沫若著。北京：人民文學社出版：新華發行，1982 {民 71}  
《沫若自傳：少年時代——我的童年》  
《沫若自傳：學生年代——我的學生年代》  
〈向兒童獻花〉  
〈青年的明天〉  
〈日本的兒童〉  
〈青年，人類的春天〉  
〈兒童文學之管見〉 《民鐸》2卷四期 1921年1月15日  
〈黎明〉(童話劇)  
〈廣寒宮〉(童話劇)  
〈天上的街市〉(詩)  
〈一隻手〉(童話)  
《郭沫若選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我的童年〉  
《周作人全集》／周作人原著。台中市：藍燈文化，民 71[1982]  
〈兒歌〉  
〈路上所見〉  
〈對於小孩的祈禱〉  
〈童話研究〉  
〈童話略論〉  
〈古童話釋義〉  
〈祖先崇拜〉  
〈關於兒童的書〉  
〈小人書二〉  
〈人的文學〉  
〈童話略論〉  
〈小孩的委屈〉  
〈王爾德童話〉  
〈呂坤的「演小兒語」〉  
〈兒童的文學〉 《新青年》8卷四期 1920年8月  
〈兒童的書〉 《晨報副刊》 1923年6月21日  
〈兒童研究導言〉 《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第三號 1913年12月  
〈兒童問題之初解〉 《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第六號 1914年3月20日

- 〈遺傳與教育〉 《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第一號 1913年 10月 15日
- 〈游戲與教育〉 《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第二號 1913年 11月
- 〈兒歌之研究〉 《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第四號 1914年 1月 20日
- 〈讀「十之九」〉 《新青年》第5卷第3期 1918年 9月
- 《周作人回憶錄》/周作人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 〈兒童文學與歌謠〉
- 《周作人文類編》 鍾叔河編 湖南文藝出版社 1988年 9月
- 〈思想革命〉
- 〈家庭教育不論〉
- 〈國榮與國恥〉
- 〈家庭教育一論〉
- 《周作人集外文》 張子善 張鐵榮編 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 1995年 9月
- 〈童話與倫常〉
- 〈死文學與活文學〉
- 〈學校成績展覽會意見書〉
- 〈小學校成績展覽會雜記〉
- 〈玩具研究(一)〉
- 〈什麼是不道德的文學〉
- 《周作人詩全編箋注》 錢理群編 浙江文藝出版社 1994
- 〈知堂雜詩抄·童話〉
- 《周作人與兒童文學》 王泉根編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 〈兒童故事序〉
- 〈兒童劇〉
- 〈童話的討論〉
- 〈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
- 〈讀各省童謠集〉
-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
- 〈「兒童文學小論」序〉
- 〈科學小說〉
- 《知堂書話》 鍾叔河編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 〈歌詠兒童的文學〉
- 〈關於伊索寓言〉
- 〈安徒生的四篇童話〉
- 〈關於讀聖書〉
- 〈陀螺序〉
- 〈土之盤筵小引〉
- 〈浮世風呂〉
- 〈蒙氏教育法的研究序〉

《周作人絕妙小品文》 時代文藝出版社

〈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

〈談油炸鬼〉

〈北京的茶食〉

〈談土撥鼠〉

《理性與人道—周作人文選》 高瑞泉編選 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4年 12 月

〈「長之文學論文集」跋〉

〈玩具〉

〈婦女運動與常識〉

〈感慨〉

《沈從文別集》/沈從文著。長沙市：岳麓 1995{民 84}

《自傳集》

《泥塗集》

《長河集》

《新與舊》

《邊城》/沈從文著。台北：谷風 1988{民 77}

《從文自傳》/沈從文著。重慶：重慶出版社 1986{民 75}

《我所成長的地方》/沈從文著。香港：三聯 2000{民 89}

《阿麗思中國游記》

《茅盾全集》/茅盾著。北京市：人民文學社出版：新華發行, 1984{民 73}

〈孩子們要求新鮮〉

〈論兒童讀物〉

〈關於兒童文學〉

〈連環圖畫小說〉

〈再說兒童文學〉

〈不要你哄〉

〈給他們看什麼好呢?〉

〈幾本兒童雜誌〉

〈從「有眼與無眼」說起〉

〈對於小學生文庫的希望〉

〈書呆子〉

〈一段麻〉

〈蛙公主〉

〈免娶婦〉

〈金龜〉

〈樹中餓〉

〈海斯交運〉

〈驢大哥〉

〈平和會議〉

〈尋快樂〉

〈大槐國〉

〈千匹絹〉

〈負骨報恩〉

〈獅螺訪豬〉

〈飛行鞋〉

《神話研究》/茅盾 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1年4月

〈小兒心病治療法〉 《婦女雜誌》1920

〈生物界之奇譚〉 《婦女雜誌》1920

〈譚天——新發現的星〉 《學生雜誌》1920

〈將來的育兒問題〉 《婦女雜誌》1920

〈腦相學的新說明〉、〈關於味覺的新發現〉 《學生雜誌》1920

〈人工降雨〉 《學生雜誌》1920

〈第一次飛渡大西洋的 R43 號〉、〈探「極」的潛艇〉 《學生雜誌》六卷十二號

〈沈船？寶藏？探「寶」潛艇！〉 《學生雜誌》七卷一號 1920

〈天河與人類的關係〉、〈時間空間新概念〉 《解放與改造》二卷十五號 1920

〈航空授命傘〉 《學生雜誌》七卷七號 1920

〈兒童公育——兼質暉、楊二君〉 《學生雜誌》七卷八號 1920

〈猴語研究底現在和將來〉 《學生雜誌》七卷九號 1920

〈少年印刷工〉 《新少年》創刊至二卷十一期 1936

〈爲何海水味鹹〉 《兒童世界》十四卷二期 1925

〈芬利思的被擒〉 《兒童世界》十三卷十二期 1925

〈喜芙的金黃頭髮〉 《兒童世界》十三卷九期 1925

《葉聖陶集》/葉至善、葉至美、葉至誠編 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3年5月

〈兒和影子〉

〈成功的喜悅〉

〈拜菩薩〉

〈小魚〉

〈兩個孩子〉

〈損害〉

〈阿鳳〉

〈一課〉

〈小銅匠〉

〈義兒〉

《稻草人》 商務印書館 1923

《古代英雄的石像》 開明書店 1931

《鳥言獸語》

《倪煥之》

《我和兒童文學》/葉聖陶等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80年 8 月

〈我和兒童文學〉

〈談談「小布頭奇遇記」〉

〈對於小學作文教授之意見〉 《新潮》第 1 期 1918

〈今日中國的小學教育〉、〈小學教育的改革〉 《新潮》 1919

〈文藝談〉 《晨報副刊》1921 3/5—6/25

〈趕緊創作適於兒童的文藝品〉 《晨報副刊》1921 年 3 月

〈兒童的想像和感情〉 《晨報副刊》1921 年 3 月

〈多多爲兒童創作〉 《晨報》1921 年 6 月

《給少年者》序〉 《給少年者》 生活書店 1935

《天鵝》序〉 《文學》150 期 1924

《列那狐的歷史》/鄭振鐸著 上海新中國書局 1932

〈竹公主〉

〈兔子的故事〉

〈花架之下〉

〈行善之報〉

〈愛美與小羊〉

〈小人國〉

〈張兒〉

〈聽明的審判官〉

〈青蛙尋食記〉

〈河馬幼稚園〉

〈巢人〉

〈我是少年〉

〈春之消息〉

〈早與晚〉

〈風之歌〉

〈牧童與狼〉

〈繫鈴〉

〈騾子〉

〈朝露〉

〈老虎婆婆〉

〈貴族與狐〉 《兒童世界》29 卷 1 期

〈「兒童世界」宣言〉 1921 9/22

〈第三卷的本志〉 《兒童世界》第 2 卷第 13 期 1922 7/1

〈兒童文學的教授法〉 浙江寧波《時事公報》1922 8/10—12

〈「稻草人」序〉 《稻草人》 商務印書館 1923

- 〈天鵝童話集序〉 1924 11/26
- 〈《列那狐的歷史》序〉 《小說月報》1925年8月
- 〈介紹《列那狐的歷史》〉 《小說月報》1926年6月
- 〈「高加索民間故事」序〉 《高加索民間故事》商務印書館 1925
- 〈中國兒童讀物的分析〉 《文學》第七卷第1號 1936年7月1日
- 〈少年讀物問題〉 《大公報》1934年5月20日 後收於《鄭振鐸和兒童文學》少年兒童出版社 1990年
- 〈《印度寓言》序〉 《印度寓言集》1925年7月
- 〈《菜森寓言》序〉 《菜森寓言集》1925年7月
- 〈寓言的復興〉 《痾僕集》 1934年12月
- 〈小說月報 安徒生號(上)卷頭語〉 《小說月報》十六卷八號 1925年8月
- 〈安徒生的作品及關於安徒生的參考書籍〉 《小說月報》十六卷八號 1925年8月
- 月
- 〈小說月報 安徒生號(下)〉 《小說月報》 十六卷九號 1925年9月
- 《這時代》/王統照著 1934
- 〈嬰孩的旅程〉
- 〈雪後〉1920
- 〈春雨之夜〉 1921
- 〈湖畔兒語〉 1922
- 〈小小的畫片〉 《兒童世界》第三卷第一期 1922
- 《丰子愷文集》/丰子愷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 1992年6月
- 《丰子愷論藝術》/丰子愷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1985
- 〈我的漫畫〉
- 〈丰子愷漫畫選自序〉
- 《子愷畫集》/丰子愷 開明書店 1927
- 〈給我的孩子們〉
- 〈貧民窟之冬〉
- 〈高櫃台〉
- 〈畫一個孩子上當舖〉
- 〈二重飢荒〉
- 〈小主僕〉
- 〈最後的吻〉
- 〈華瞻的日記〉 1926
- 〈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 〈作父親〉
- 〈隨筆五則〉
- 〈兒女〉 1928
- 〈夢痕〉 1934

〈送阿寶出黃金時代〉 1934

〈鼓樂〉

〈窮孩子的蹺蹺板〉

〈賭的故事〉(至〈爲了要光照〉皆發表於兒童書局的《兒童故事》)

〈生死關頭〉

〈一簣之動〉

〈伍圓的話〉

〈博士見鬼〉

〈大人國〉

〈有情世界〉

〈種蘭不種艾〉

〈夏天的一個下午〉

〈油鉢〉

〈明心國〉

〈姚晏大醫師〉

〈斗火車龍頭〉

〈新年話舊〉

〈騙子〉

〈銀窟〉

〈獵熊〉

〈毛廁救命〉

〈爲了要光照〉

《車廂社會·談自己的畫》 1935

〈讀《讀緣緣堂隨筆》〉 1946

《冰心全集》/冰心著。福州市：海峽文藝 1994{民 83}

《繁星》

《春水》

〈冰心全集自序〉

〈往事〉

〈可愛的〉

〈紀事〉

〈回顧〉

〈最後的安息〉

〈骰子〉

〈一個兵丁〉

〈一只小鳥〉

〈魚兒〉

〈三兒〉

〈離家的一年〉

〈寂寞〉

〈童年雜憶〉

〈冬兒姑娘〉

〈分〉

《冰心》/冰心著，卓如編。香港：三聯 1986{民 75}

《冰心小說集》/冰心著。上海：開明 1948{民 37}

《冰心自傳》/冰心著。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局經銷 1995{民 84}

《寄小讀者》 北新書局 1926 .5

《冰心和兒童文學》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90年 9 月

〈我的熱切希望〉

〈「小桔燈」出版後記〉

〈問答詞〉

〈我是怎樣被推進兒童文學作家隊伍裡去〉 《我和兒童文學》 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 1980

〈童年雜憶〉 《新文學史料》1981 年第三期

〈筆談兒童文學〉 《少年文藝》 1978 年 6 月號

〈回顧〉 《時事新報 學燈》 1922年 4 月

〈紀事—贈小弟冰季〉 《晨報副刊》1922 年 8 月

〈別後〉 《小說月報》 1924年 9 月

〈莊鴻的姐姐〉 《晨報》1919 年 12 月

〈法律以外的自由〉 《燕大季刊》1921 年 4 月

〈海上〉 《燕大季刊》1921 年 6 月

〈愛的實現〉 《小說月報》1921 年 7 月

〈最後的使者〉 《小說月報》1921 年 11 月

〈世上有的是快樂....光明〉 《燕大季刊》 1920年 4 月

〈國旗〉 《晨報》1921 年 1 月

〈夢〉 《小說月報》 十四卷四號 1921

《凌叔華小說選》/凌叔華著。台北：洪範 1984{民 73}

《花之寺；女人；小哥兒倆》/凌叔華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6 {民 75}

《凌叔華》/計蕾編選。北京：華夏出版社：新華經銷 1997{民 86}

《丁玲全集》

〈給孩子們〉

## 2 晚清以迄四 0 年代中國重要期刊雜誌

《青年雜誌》(《新青年》的前身),《新青年》。1915 年發行,1988 年重印,上海書店 臺灣大學總圖書館藏

《甲寅雜誌》 = The tiger / 秋桐主編。臺北市：東方文化書局, 1975{民 64}年復印

《申報月刊》。1932 申報館  
《晨報副刊》  
《時事新報》  
《婦女雜誌》  
《新潮》。1919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 臺灣大學總圖書館藏  
《民鐸雜誌》。1916 上海學術研究會 中研文哲藏  
《少年中國》。1919 少年中國學會,上海亞東圖書館 臺灣大學總圖書館藏  
《少年》。1922 人民出版社 中研院近史所圖書館藏  
《少年文藝》。1953 少年兒童出版社 中研文哲藏  
《少年雜誌》。1911 商務印書館  
《中華童子界》。1914 商務印書館  
《兒童世界》。1922 商務印書館  
《兒童畫報》。1922 商務印書館  
《小朋友》。中華書局 1922  
《中學生雜誌》。1930 開明書店  
《新少年》。1936 開明書店 (1945年改為開明少年)  
《小說月報》  
《大眾文藝》。1928 現代書局 中研文哲藏  
《創造月刊》。1926 上海書店 臺灣大學總圖書館藏  
《拓荒者月刊》。1930 拓荒者月刊社 中研文哲藏  
《文學雜誌》。1937 商務印書館  
《文藝月報》。1954-1959 上海文藝出版社  
《萌芽》。1956 萌芽編輯委員會  
《小朋友》。1958 少年兒童出版社  
《春暉學生》  
《格林童話》  
《安徒生童話》  
《王爾德童話》  
《格列佛遊記》  
《魯賓遜飄流記》  
《愛的教育》

## 二.間接參考文獻

### 1.文學史料

夏志清原著,劉紹銘編譯《中國現代小說史》。傳記文學社出版 1985{民 74}  
陳平原、夏曉虹所編《二十世紀小說理論資料》。北京市:北京大學 1997{民 86}

## 2.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論集，及相關單篇論文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李歐梵文化評論精選集》。台北市：麥田 1996{民 85}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編》。台北市：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

發行 1998{民 87}

陳思和 《中國新文學整體觀》 業強出版社 1990年3月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9年12月

陳東原《中國教育史》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6

陳萬雄《五四新文學的源流》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7年1月

賈植芳、蘇興良編《文學研究會資料》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錢谷融編《文學研究會評論資料選》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6

藤井省三《魯迅比較研究》 陳福康編譯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97年3月

金燕玉《茅盾的童心》南京出版社 1990

萬蒿 《葉聖陶新論》 蘭州大學出版社

張堂錡 《清靜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1月

陳星 《教改先鋒—白馬湖作家群》 幼獅出版公司 1996年12月

胡適〈國語運動與文學〉 《晨報副刊》1922年1月9日

盛巽昌〈鄭振鐸的編輯匠心〉 《兒童文學研究》第19輯 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 1985

方軼群〈回憶《小朋友》的幼年〉 《長長的列車 ---小朋友》 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

1992

譚桂林：〈魯迅小說啓蒙主題新論〉《魯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 頁28

譚桂林：〈論魯迅對童年母題文學的歷史貢獻〉《魯迅研究月刊》 1990年第9期，頁31

王鐵坤〈「爲人生」與「改良社會」——淺議魯迅與葉聖陶的小說創作〉

張堂錡〈民初教育的生動縮影——葉聖陶短篇小說中的教師形象〉 《中央日報》1996  
年10月6日

祁述裕〈論「五四」時期「爲人生」作家群的審美流向〉 《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1987年6月

謝泳〈寡母扶孤現象對中國現代作家的影響——對魯迅、胡適、茅盾、老舍童年經歷的一種理解〉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2年8月第三輯

李惠貞〈論文學研究會的「問題小說」〉 《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1982年9月

陳福康〈鄭振鐸與文學研究會〉 《新文學史料》 1989年第4輯

錢虹〈屬於她們的「真善美」世界——論五四女作家群「愛的哲學」及其藝術表現〉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988年第一輯

金燕去〈茅盾兒童小說初探〉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4年12月第4輯

閻晶明〈略論五四小說中的母愛〉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986年第三輯

商金林〈開拓我國童話創作的路——稻草人漫評〉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994年  
第三輯

- 樂梅健〈至聖至美至誠：記葉聖陶的兒女〉 國文天地 1997年10月
- 廖咸浩〈非西方成長（小說）的試煉：在反叛與扎根之間〉 幼獅文藝 2000年6月
- 廖咸浩〈有情與無情之間：中西成長小說的流變〉 幼獅文藝 一九九六年七月
- 錢理群〈文體與風格的多種實驗—四十年代小說研讀札記〉 《新華文摘》1997年第8期

### 3.中國近代兒童論述

- 蔣風、韓進〈魯迅周作人早期兒童文學觀比較〉 魯迅研究月刊 1994年2期
- 湯山士美子〈我對魯迅、周作人兒童觀的幾點看法〉 《魯迅研究月刊》1988第一期
- 蓮子：〈談魯迅的兒童觀與其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共相性〉《湘潭大學學報》（社科版）1989年第1期 頁38
- 羅興萍〈尋找童年的小搖車——周作人的兒童文學〉 天津社會科學 1996年1期
- 韓進〈周作人的童話研究〉《兒童文學研究叢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 韓進〈周作人早期兒童觀初探—兼述「以兒童為本位」觀的提出〉 《浙江師大學報》1992
- 新村徹〈周作人的兒童文學論—中國兒童文學小議之一〉 《日本學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選釋》吉林大學出版社 1987
- 林文寶〈文學研究會與兒童文學運動〉 《國教之聲》第二十八卷第三期
- 盛巽昌〈孫毓修和早期兒童文學〉 《兒童文學研究》第八輯 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 1980
- 邵宇〈沈從文的兒童文學創作評略〉 江蘇教育學院學報 1994年一期
- 方衛平〈論「五四」時期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自覺〉 東北師大學報 1994年2期
- 章紅〈兒童文學觀演變之評述〉 學前教育研究 1996年2期
- 〈試論茅盾對現代兒童文學的歷史貢獻〉 喀什師範學院院報 1999年2期
- 熊秉真〈好的開始——中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2年。
- 〈試窺明清幼兒的人事環境與情感世界〉《本土心理學研究》，第二期， 1993年
- 〈中國進世人筆下的兒童健康問題〉《中研院近史所集刊》， 23期上，1994年
- 〈中國近世兒童論述之浮現〉，收於魏秀梅、郝延平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五歲祝壽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8年
- 熊秉真·呂妙芬編〈入理入情：明清幼學發展與兒童關懷之兩面性〉《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後/現代性》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9年6月
- 子揚、子羽編《魯迅和兒童文學》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94年2月
- 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 麥田 2000年

熊秉真 《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 聯經 1995年  
喬衛平 《中國古代幼兒教育史》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  
湯銳 《現代兒童文學本體論》 南京：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 1995  
方衛平 《兒童文學的當代思考》 濟南：明天出版社 1995  
胡從經 《晚清兒童文學鉤沉》 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 1982  
方衛平 《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 江蘇少兒出版社 1993  
雷僑雲 《中國兒童文學研究》 台北學生書局，1988年  
張聖瑜 《中國兒童文學研究》 上海：商務印書館，1970年  
蔣風《中國兒童文學》 太原：希望出版社，1998年  
張香還《中國兒童文學史》 1988  
王泉根 《中國兒童文學現象研究》 1992 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  
王泉根 《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文論選》 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8月  
孫建江《二十世紀兒童文學導論》 1995  
金燕玉《中國童話史》 1992 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  
金鳳山等編《兒童文學辭典》 1991  
蔣風 《中國兒童文學講話》 江蘇文藝出版社 1959  
朱少強《兒童文學的本質》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97年11月  
李杭、歐陽侃編著《中國古代童話新編》 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 1996  
盛巽昌、張錫昌 《中國現代名家童話選》 新蕾出版社 1989

#### 4. 外文資料

Erikson, Eric H.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W.W. Norton, Press, 1986)

Philippe Arie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2)

Lloyd deMause,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

Philip Greven, *Spare the Child: the Religious Roots of Punishment and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Physical Abus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2)

C. John Sommerville, *The Rise and Fall of Childhoo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 (四) 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計畫擬採用文學史料、小說文本、相關研究成果等項目相參互證的方式，就中國現代小說中的「孩童論述」，進行深入探究。其中，小說文本是剖析探討的主要依據，包括作家們的現代小說創作及兒童文學的翻譯創作；其它領域的相關研究是深化並開拓研究面向的重要參考，文學史料則可見當時的政治文化背景與作家創作間的互動關係，為研究提供現實基礎。

本計畫所關涉之範圍至廣，亦有一定之困難度。主要原因，一則在於原始資料卷帙浩繁，所涉及者，除小說文本本身外，還包括小說作者的其它譯作、雜文、論述等。欲求全面性之研究，必得長時間全力投入；再則，晚清至四〇年代的文學史料，現今台灣各研究藏書機構的館藏不全，若欲全面蒐集，勢必求助於哈佛燕京、史丹福胡佛、大陸北京、上海等各大國外圖書館。更何況，這是一前人未曾觸及的研究方向，在缺乏具體直接的研究參考下，舉凡資料篩選、角度切入、論述架構之建立，都必須自起爐灶。不過，由於本年度擬聚焦於五四時期魯迅、周作人等人的論述，故在進行步驟上，將先儘可能於各圖書館大量蒐集資料，閱讀小說文本與期刊雜誌，掌握彼時之小說風貌與相關背景。同時，亦廣泛涉獵西方相關之文學／文化理論，及當代各類評論資料，以期在其間歸整出適合之論述架構，做為研析文本之參考。而「文本為主，理論為輔」，當係閱讀、整理資料時的重要原則。具體做法如下：

一、以魯迅、周作人為主軸，蒐集並研讀晚清以迄四〇年代的重要期刊雜誌，就其間涉及孩童論述的小說及論述性文字予以爬梳整理；

二、蒐集並研探晚清以來對西方兒童文學及理論的譯介資料，研探當時中國學者作家對它們的吸收與轉化實踐；

三、廣泛閱讀前述「間接性參考文獻」之二、三、四類，擷取其成果精華，並適切挪用、融匯至本計畫的研究之中；

四、為求資料齊備，擬赴北京、上海各大圖書館蒐集資料，並與陳平原、汪暉、陳思和、王曉明等學者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

研探重點將包括：從晚清以來，《蒙學報》、《小孩月報》、《新民叢報》、《新青年》、《晨鐘報》等重要報刊均多有討論教育問題之篇章，這些關乎（孩童）教育的論述，以及當時對西方兒童觀念、童話小說的譯介情況，是否，以及，如何左右了現代小說中的孩童論述？魯迅、周作人、葉聖陶、冰心、王統照等人對孩童的關懷及其具體文學實踐的交織匯通，將會如何形塑出彼時的孩童論述？《格林童話》、《王爾德童話》、《愛的教育》等重要兒童文學的譯作出版，對中國現代小說之孩童觀的具體影響為何？從晚清到三〇年代，「孩童」的概念是如何由模糊而清晰、由抽象而具體？文學想像中的「孩

童」，是否能從僅作為政治憧憬的修辭符號，轉變為具有內在主體性的獨立個體？其間歷經了怎樣的轉折？而在這一過程中，又內蘊了怎樣的矛盾與複雜性？也因此，本計畫所試圖探討的，將不只是「孩童」在小說敘事中形象言行的分析，或成長歷程的觀照，更包括他們在成人社會中所被賦予的社會意識、教育理念、階級認同、性別觀念、國族想像，以及游移其間的繁複辯證過程。

## （五）結果與討論

本年度的計畫已有初步成果，且由參與計畫的研究生顏健富撰寫成文，發表於《漢學研究》第二十卷第二期（2002年12月）。詳見以下所附：

### 「發現孩童」與「失去孩童」

#### ——論魯迅對孩童屬

#### 性的建構

顏健富

#### 一 前言：新中國的想像

五四時期眾多作家紛紛鬧鬧著建構新中國，或是憂心國局、或是批判腐朽傳統，鼓吹以「新學說」<sup>1</sup>救國，呈現的是擺脫舊中國的包袱，期待新中國的到臨，當中融合著期許、憂心、焦慮等錯綜情感，遂成就一則「感時憂國」<sup>2</sup>的書寫。因受到西方啓蒙的影響，中國式的「倫理」受到反思<sup>3</sup>，掀起

---

<sup>1</sup> 這裡所謂的「新學說」類似梁啟超的「新民」說；陳獨秀批判孔教，倡導「科學」與「民主」，胡適主張有機式吸收西方文化，均呈現出一股新氣象，當中大量借用西方觀念，以推倒中國舊有的文化體系。

<sup>2</sup> 夏志清用「感時憂國」來評論「新文學」，將作品「表現道義上的使命感」、洋溢著愛國熱情、痛感外憂內患、憂時傷國稱為「感時憂國」的精神。見夏志清：〈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愛情·社會·小說》（台北，純文學，一九七四，三版），頁七九至一〇五。

<sup>3</sup> 如陳獨秀就在〈吾人最後之覺悟〉說：「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使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

了以「人」為中心的啓蒙運動，「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事務，其首位在人，人立而後凡事舉」<sup>4</sup>。對「人」的發現，婦孺的地位也重新受到審視，在〈燈下漫筆〉裡魯迅提到「人肉筵宴」的排位：「大小無數的人肉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昧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sup>5</sup>魯迅接續根據《左傳》將人分十等：王、公、大夫、士、皂、輿、隸、僚、僕、台，每一個階層壓制其底下的階層，而最底下的「台」，卻「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對中國傳統封建的階層制加以批判，對「妻」與「子」地位的邊緣性也有其透視與關注。

擺在這種時代的「話語形構」<sup>6</sup>（discursive formative）下，梁啓超、魯迅、周作人乃至三零年代的左翼敘述發現處於邊緣地位的孩子的地位，並寄予眾多期待，「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sup>7</sup>。將孩子與國家未來的命運聯繫起來，他們是革命年代被賦予重任與想像的重要象徵，這方面已有學者論述，如梅師家玲所說：

「少年中國」之說，卻是在肯定少年原先即具有的「青春」、「進取」、「希望」等意義的同時，更視其體現「現代性」的表徵，對他投射了大量「革新」、「進步」、「光明的開端」等 關乎「新國家」的憧憬想像。<sup>8</sup>

梅師的說法固然針對少年，事實上論述的對象還可擴大到孩童身上，在開拓現代性的版圖上，孩童的特質正好代表前朝的結束，新時代的開始。孩童或少年身上寄寓大量啓蒙的想像與國族論述，正好提醒我們從傳統走到現代，孩童的地位由下而上提升，「孩童」的屬性（identity）在這新舊文化系

---

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近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覺悟，蓋猶在惘恍迷離之境。」

<sup>4</sup> 魯迅：〈文化偏至論〉，收於張師健校訂《魯迅全集》（台北市，谷風，一九八九），頁

<sup>5</sup> 魯迅：《墳·燈下漫筆》，同注 4，頁二一七。

<sup>6</sup> 所謂「話語形構」，根據傅珂的說法，乃是「社會各層面都有其特定的話語（discourse）存在。這些話語互相推衍連結，形成一個可以辨認的『話語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如『社教制度、經濟及社會體系、行為模式、以及各種系統規範』中。在此一話語形構下，所有知識之獲取及思維行動之方式都有一定軌跡可尋，而由此產生的一個特殊的文化及認知體系，就是前已提及的『知識領域』。」

見米歇·傅珂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一九九五，三版），頁二九。

<sup>7</sup> 魯迅：《南腔北調集·上海的兒童》，同注 4，頁五六二。

<sup>8</sup> 梅師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啓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啓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晚明至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研討會）論文集》（主辦：美國哥大東語文化系、北大中文系、北大廿世紀文化中心，二〇〇〇）

統中呈現極大轉變。孩童主體的建構由此耐人尋味，「所述主體」是「一個可由不同的個人來填補的特殊、空白所在……原因正是在於主體的位置可以被指定」<sup>9</sup>。

從對人的發現到兒童的發現，提升其地位，這樣的過程看似理所當然，可是其中隱藏的矛盾性卻是一般論者所忽略的。五四在西方「人本」觀念下倡導兒童的獨立個性，諸如「（兒童）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內外兩面的生活」<sup>10</sup>、「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於孩子的發達。」<sup>11</sup>但是當把孩子放到「民族—國家」的集體性觀念時，孩子卻又被賦上成人的政治想像。這當中的矛盾其實在西方社會史裡一直存在，當步入文明社會重新發現兒童的概念，「以之為人倫社會進步之重要指標」，卻又是為「童年步步制度化、物質化、與牢籠化的開始。」<sup>12</sup>

五四啓蒙分子一方面在新舊文化思想的對照下發現兒童的主體性，一方面卻用成人想像預設了兒童的主體性，形成矛盾的狀況，令我們關注的是孩童的主體性顯然是在一定的話語體系下浮動的，呈現出矛盾的局面，因此我們不得不問這群孩童如何在特定的話語體系下展現身段？

## 二 發現兒童：從「長者本位」到「幼者本位」

以「長者」為本位的傳統體制，到了五四時期，受到西方的啓蒙體系的衝擊，兒童得以被大量論述，魯迅提出「幼者本位」使得兒童的概念重新被召喚與命名：「希望覺醒的人，應該洗淨了東方古傳的謬誤思想，對於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力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以準備改做幼者本位的道德。」<sup>13</sup>

顯然地，魯迅以上的說法是經由西方思潮所開拓出來，在西方「義務思想」的觀念下，對照出本身文化的「權力思想」，其觸角正好針對著論述背後隱藏的「長者本位」，形成「五四反傳統主義以『西學』（西方之本主義文化）反『中學』（中國封建傳統文化）」<sup>14</sup>的策略。

---

<sup>9</sup> 傅柯

<sup>10</sup> 周作人〈兒童的文學〉：「兒童在生理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內外兩面的生活。兒童期的二十幾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預備，但一面也自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見《周作人全集》（台中，藍燈文化，一九八二），頁五七七。

<sup>11</sup> 魯迅：《墳·我們現在怎樣作父親》，同注4，頁一三六。

<sup>12</sup> 熊秉真：〈入情入理：明清幼學發展與兒童關懷之兩面性〉，收於熊秉真、呂妙芬編《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史》（台北，中研近史所，一九九九），頁三三九。

<sup>13</sup> 同注11。

<sup>14</sup> 汪暉認為這種反抗精神在思維內容上直接承續了譚嗣同對封建綱常的沈痛攻擊，嚴復關於中

在強烈的自覺意識下，魯迅對整個社會環境的兒童關懷有其焦慮與批判，當「我們的新人物講戀愛、講家庭、講自立、講享樂了，但很少有人為兒女提出家庭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問題」<sup>15</sup>、「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在此我們看到他把「長者」與「幼者」的位置並列，以剖析新時代中「長者」與「幼者」之間的關係，突顯出其中的危機，如「長者」對「幼者」的忽略，或是當「幼者」走向帶有權力意涵的「長者」位置時卻反而壓迫起「幼者」。為改變不良的惡性循環，應以「義務」思想來取代傳統的「權力」觀，「洗盡了東方古傳謬誤的思想」。他在〈我們怎樣作父親〉一文，提出父親教育兒童的方法，第一是「理解」，第二是「指導」，第三是「解放」<sup>16</sup>。在這種兒童教育的架構下，使得他一方面對教育兒童的傳統方式做了諸多反思與建議，激烈批判摧殘孩童的舊文化機制，一方面也對孩童的面貌、特質等有眾多發現。在這論述的脈絡下可見他頗受西方兒童史的兩大主題：「童年概念」(concept of childhood) 或「兒童對待」(treatment of children) 影響。

〈二十四孝圖〉裡，魯迅揭開二十四孝中的荒唐、虛偽，其中他感到最不滿的是「郭巨埋兒」與「老萊娛親」，前者記述郭巨欲埋掉幼兒以免分去母親的糧食，後者批判七十多歲的老萊子「詐跌仆地，作嬰兒啼」<sup>17</sup>以取悅母親，當中的不符倫理或是矯情，對兒童做了不良示範。可是他的批判視角並不停留於過去，對當今的孩童心靈如何受到傷害更是關注：在「改革過的中國」，當孩子早已從「孟京哭竹玉祥臥冷」的古訓中蛻出時，居然又有一些新式的「愛國之士」，「或者用筆，或者用舌，不怕勞苦的來給他們教訓。一個說要用功，古時候曾有囊螢照讀、鑿壁偷光的志士，一個說要愛國，古時候曾有十幾歲突圍請援、十四歲上陣殺敵的其童」<sup>18</sup>的觀念。

對傳統大開殺戒時，讓我們看到五四學人以西學來「糾正」傳統的策略，他從西方引入兒童讀本，如翻譯《愛羅先珂童話集》、《錶》、《小約翰》等，對西方兒童的大量翻譯成了五四文壇可觀的成績。兒童文學的創作與理論架

---

西文化尖銳對比的精神分析，以及梁啟超大力提倡的「新民學說」，但形成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性理解的更為重要原因，是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歷史過程對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啓示。

見汪暉：〈文化 / 心理結構〉《反抗絕望——魯迅及其「吶喊」「彷徨」研究》(台北，久大，一九九〇)，頁六七。

<sup>15</sup> 同注 7。

<sup>16</sup> 魯迅這裡的「理解」是針對中國人把兒童當成「縮小的成人」的誤解，可是孩子與成人世界不同，因此要「理解」。長者不應以命令的方式，而是「指導」，以養成其耐勞體力、高尚道德、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解放」是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成為獨立的人，而非屬於父母的的人。同注 11，頁一三六至一三七。

<sup>17</sup> 魯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圖》，同注 4，頁二五〇。

<sup>18</sup> 魯迅：《且介亭雜文·難行和不信》，同注 4，頁四九。

構的建設漸受到重視。他在翻譯之餘，親身創作以兒童為題材的作品，如其《朝花夕拾》是一系列追憶往事的童年母題的作品，其中〈五猖會〉、〈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篇更是處理了童時的受創經驗，回顧童年的「坎坷」，缺乏尊重兒童的大環境與妥當教育孩童的方式。

魯迅在「幼者」本位之下，了解孩子自有其世界，並非「縮小的成人世界」<sup>19</sup>。從孩子的角度出發，他注重遊戲的重要性，「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sup>20</sup>。除此之外，他對孩童發出讚嘆之辭：「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處想到昆蟲的語言；他想飛上天空，他想潛入蟻穴。」<sup>21</sup>孩子這種「可佩」的特質，使得他相信孩童在「希望在於將來」<sup>22</sup>的思維邏輯上肩負起「將來」的重擔，把一切希望投射到將來，魯迅因此意識到孩童的重要性，呼籲覺醒者要「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sup>23</sup>一方面也呼籲幼者勇猛前進：「前途很遠，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前面才有路……去罷！勇猛著！幼者呵！」<sup>24</sup>

在發現兒童中，魯迅如上所述積極透過各方面管道改造兒童，如對傳統殘害兒童身心的「長者本位」做出犀利的批判，翻譯西方童話建構兒童面貌的範版，或是稱頌兒童的特質呼籲其向前邁進，因為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將來是子孫的時代」<sup>25</sup>，孩童的改造成了國民性改造的象徵，如論者所說：

魯迅的童年母題創作，超越了一般性的童年趣事的回憶，達到了改造國民精神和重建民族人格的現代思想高度。<sup>26</sup>

我們由此看出魯迅對孩童改造的迫切性，淵源於對國民性的強烈不滿，在《阿 Q 正傳》極為辛辣地描繪了國民劣根性。基於「國民性可以改造於未來」<sup>27</sup>的信念下，孩童成為五四知識分子「新民」<sup>28</sup>的重要指標。

<sup>19</sup> 同注 11。

<sup>20</sup> 魯迅：《野草集·風箏》，同注 4，頁一七八。

<sup>21</sup> 魯迅：《且介亭雜文·看圖識字》，同注 4，頁三五。

<sup>22</sup> 魯迅：《吶喊·自序》，同注四，頁四一七。

<sup>23</sup> 同注 11。

<sup>24</sup> 此乃是魯迅轉引日本作者有島武郎的話，見魯迅：《熱風·與幼者》，同注 4，頁三六二。

<sup>25</sup> 魯迅：《熱風·隨感錄五十七》，同注四，頁。

<sup>26</sup> 譚桂林：〈論魯迅對現代童年母題文學的歷史貢獻〉《魯迅研究月刊》一九九〇年第九期，頁三一。

<sup>27</sup> 魯迅：〈譯文序跋集「出了象牙塔」後記〉

<sup>28</sup> 在新舊文化交替的過程中，眾多啓蒙分子提出「新民」說，如梁啓超〈論小說與群治關係〉、〈少年中國說〉提倡「新民」或是賦予少年政治想像，做為改造國民性的策略。

在「發現孩童」的基調下，孩童被放入國民精神改造的位置來觀看，與啓蒙論述聯繫，因此當魯迅歌頌未來世界屬於兒童、試圖將他們從封建體制解放出來時，事實上已如前述西方兒童社會史的「矛盾性」形塑出一個牢籠，套著兒童。在重新命名的過程顯見了內在的衝突，若我們繼續以長者 / 幼者的關係來看魯迅的小說，會看出更多的移位，兒童的屬性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是流動的。因此本篇論文在建構起魯迅的「發現孩童」時，卻很弔詭的一步步走向論證「失去孩童」的逆反方向。

### 三 「小說」孩童

魯迅的孩童觀具顯了從「長者本位」到「幼者本位」的過渡，這種過渡牽涉到眾多意義，將「長者」/「幼者」的關係探討放到「傳統」/「西方」的架構上來探討。孩童的屬性如前述在新舊世界有眾多的變動，而放到魯迅的小說裡，我挑選了其參與新文化運動的前後兩段時期，也是一般學者所謂的「吶喊」與「徬徨」時期作為時間上的對照點，以分析五四新舊文化衝突中兒童屬性的變動如何在其生命歷程的巨大變動中有錯綜複雜的移位。

#### (一) 孩童「吶喊」：對傳統的控訴

魯迅在早年曾以文言文寫〈摩羅詩力說〉，強調文學的功用，「啓人生之閥機，而直語其事實法則，為科學所不能言者」，他相信文學可以改造精神，靠的是少數「不為順世和樂之音」的「摩羅詩人」。摩羅詩人是精神之戰士，「剛健不撓，報誠守真」，「不取媚於群，以隨順舊俗」<sup>29</sup>。魯迅本身具體實踐了摩羅詩人的精神，他棄醫從文，以改造國民為志，展開了其「吶喊」的生涯。他曾因為與《新青年》其中一位負責人錢玄同抗辯「鐵屋子」理論而開始寫小說，以喚醒鐵屋子裡熟睡的大眾：

假如一間鐵房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  
不久就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現在你

<sup>29</sup> 魯迅：《·摩羅詩力說》，同注 4，頁。

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只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

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sup>30</sup>

鐵屋子在這裡被喻為壓制人的傳統桎梏，魯迅意識到反傳統的困難性，喚醒了人，可是卻衝不出鐵屋子。徒然增加痛苦，不過本著「希望是在於將來」，希望是「不能抹殺的」<sup>31</sup>，魯迅以摩羅詩人的姿態加入了「吶喊」的行列。在亢奮的狀態中，一再把觸角對準於傳統，做出「全盤性的反傳統」<sup>32</sup>，如〈狂人日記〉的狂人激切喊出：「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喫人』！」

在吃人的陰影下，吃與被吃的主題在小說裡不斷回繞，小孩首當其衝，無論是在魯鎮或是鄉土，出場時大多奄奄一息，作者彷彿已肩不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狹隘幽暗」的地方去。魯迅曾把中國形象比作「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sup>33</sup>。〈藥〉裡的革命青年夏瑜被殺頭，傳統迷信的社會相信其血有助於治病，用來蘸饅頭賣出。患有肺癆的小栓彷彿「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在父母的殷切期待下，吃蘸了血的饅頭，嚥下的是成人世界的昏庸悲劇，以其死亡向世界吶喊。孩子沒有策反的能力與選擇，只能作為一種犧牲品的方式，被母親悼念。〈明天〉裡單四嫂子以紡織養活三歲的寶兒，母子一向相依為命，可是寶兒卻陷入重病。單四嫂求神籤、許願，最後去求何小仙，得到「保嬰活命丸」的藥方，讓寶兒服下，一命嗚呼。很明顯的其中對宗教的迷信、落後的傳統做出強烈的批判，呼應的是作者的切身之痛，他在多處提到赴日學醫乃是為「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sup>34</sup>。從現實的父親到小說的兒童因誤服迷信藥方而遇害，呈現的是對中國傳統的批判。尤其是這些無法選擇生命情境的孩童牽扯進去，赤裸裸看出整個宗教迷信如何箝制著芸芸眾生，即或像只有卑微願望的寶兒也無所逃遁，「媽——爹賣餛飩，我大了也賣餛飩，賣許多許多錢，——我都給你」，傳承如此卑微的父業，卻注定要落空，魯迅用了近乎苛刻冷酷的標準來對待其筆下的孩童，卻引發我們思考怎樣的「藥」才能「救救孩子」？由此兩篇小說裡的「藥」有著更深層的意涵，怎樣的「藥」才能打造未來新中國？

<sup>30</sup> 魯迅：《吶喊·自序》，同注 4，頁四一八。

<sup>31</sup> 同注 30。

<sup>32</sup> 此乃是林毓生語，他用「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觀點來研究五四時期的反傳統思想，見《中國意識的危機》（貴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

<sup>33</sup> 魯迅：《兩地書》，同注 4。

<sup>34</sup> 同注 30，頁四一四。

在講求現代化、科學的五四時代思潮中，魯迅透過無辜的「受害者」宣告了與傳統絕裂。以上兩位孩子被逼到死亡的邊緣，背負著整個中國古老的傳統弊病，未及成長，突顯大人的愚昧與迷信。孩子的犧牲由此成為凝視中國未來的方法，他們帶著沈重的使命感，質疑詰問中國的「明天」與「未來」，反諷的是兩篇小說裡病重的孩童，在小說敘事者對「明天」、「天亮」等光明燦景的期許中步入黑暗世界。華小栓與寶兒是吃藥而死，〈狂人日記〉裡的妹子則是被吃，但「吃」與「被吃」都殊途同歸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妹子比起病懨懨的小栓、寶兒更是死狀可怖，在劊子手或狼爪下連皮帶肉被吃，驚嚇恐怖，鮮血斑斑。五歲的妹子竟然被哥哥、母親混合在飯菜裡吃掉。〈狂人日記〉如此活生一幅人肉筵席，有著四千年吃人履歷的傳統。魯迅透過孩童的「受害者」身分的「失聲」來反撲傳統封建，其「失聲」遙遙呼應的卻是狂人在小說末「救救孩子」的大分貝口號。作者將傳統封建當成全盤式的整體，大力批判，讓我們一再透視孩子如何被封建體制吃掉。

這些受傳統荼毒的孩童，命定被放到「弱者」的地位加以凝視、思考，如作者曾自說：「說到『爲什麼』作起小說罷，我們抱著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的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sup>35</sup>在「吃」或「被吃」的架構上，以引起療救的注意，背後預設了「拯救者」與「被拯救者」的位置，小孩以其生命的消失揭發幾千年的「吃人」傳統外，更重要的是引起類似狂人、瑜兒等拯救者的注意，將他們從傳統的桎梏中救出。如果說魯迅的孩童觀是從「長者本位」過渡到「幼者本位」，小說裡的幼者卻被客體化成「被拯救者」，有待長者前來拯救。作為「幼者本位」原是對傳統文化中的「長者本位」制的反抗，當小說裡的幼者走入死亡中，作為另一種反抗傳統的手段時，幼者的「本位」卻已悄悄移位。同樣是對傳統的策反，可是幼者卻在作者的反傳統中被邊緣化成「被拯救者」。孩童的屬性在變位中呈現異動，從國民性重構的指標變成傳統機制的受害者，以其凋零凸顯傳統封建的磨刀霍霍。

當用西方的發展模式拓展現代性時，農村逐漸被城市取代，農村的未開發性正是傳統封建的潛藏之地，爲五四作家韃之伐之。魯迅筆下的鄉土也有許多傳統的殘餘，成了停滯落後的農村。〈風波〉以「無思無慮，這真是田家樂」的黃昏田景揭開序幕，裡中卻處處跟不上革命的步調，已是民國六年，農民卻生活在「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狀態中，如對張勳復辟感到陌生，謠傳「皇帝會坐龍庭」的消息（已除去帝制）。面對愚昧守舊與終日唸著「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曾孫女六斤壓抑不住內心不滿，可是又怕被認出，於是直奔到河邊，藏在烏柏樹後，伸出雙丫腳的小頭大聲喊：「這老不死的！」

<sup>35</sup> 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樣作起小說》，同注 4，頁五〇八。

小孩之直率一覽無餘，顯現了對古老世界的反叛姿態。當城鎮人民開始剪下辮子，村民仍在支持或反對辮髮的爭議中小孩卻無法在革新的潮流下受惠。農村阻擋了外在文明的侵入，魯迅當然不會輕易放過批判的機會，把孩子的屬性控緊在受害者的層面上，以反撲傳統。在農民對辮子風波極具戲劇性的見風使舵心態中，六斤悄悄步上裹腳的傳統，形成最大的反諷：「伊雖然新近裹腳，卻還能幫同七斤嫂做事，捧著十六個銅釘的飯碗在土場上一癩一拐的往來。」雖然在開場時顯見反叛傳統個性的六斤，可是仍無法自身其外，傳承著上一代的枷鎖，土場形如封建體制的暗喻，傳統的女性就如此「一癩一拐」地走了幾百年。

由此鄉土在西方現代性的關照下，一再替傳統封建背黑鍋，似乎成爲傳統的所指（signified）。爲了「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一再把鄉土寫成病態社會，如〈故鄉〉裡敘事者因老屋即將出賣返回睽違二十餘年的故鄉，作爲告別老屋的儀式，重逢童年時家裡雇農的兒子潤土。敘事者在回憶中強調了潤土在其心中的「小英雄」形象，夏天時到海邊撿貝殼、冬天時能裝弓捉小鳥、雪地上捉麻雀，能講各式鬼故事，管西瓜、防獾豬、刺蝟，潮汛來時觀看跳魚，兩人拆解了主從關係建立起深厚的友情，潤土的形象甚至成了敘事者的原鄉記憶：「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頸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魯迅對農家孩子的純真活潑寄予深切的關愛，可是並非如冰心般滿足於對童真的頌揚，而是對農民社會有著更深層的洞見。這位當年的「小英雄」如今「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表情；動著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老爺！』」那曾經被拆解的階級觀在時移事往後又重新建構，敘事者與潤土已隔遠，潤土甚至要兒子水生來磕頭。潤土的極端轉變令我們不得不注意這些小孩是如何生活過來的？「多子、飢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向一個木偶人了。」中國的希望在將來的孩童身上，可是當這批孩童長成後，卻又走回到傳統的桎梏。由此，敘事者不只告別了老屋，以其童年記憶的幻滅，作爲對農家子弟的美好形象的告別儀式，要到哪裡建構孩子/少年的形象範本？在魯迅的批判體系裡，鄉土徒然成爲一種缺憾，如「潤土」本身的名字就帶有傳統封建體制的期許，其頸上套著明晃晃的銀圈，乃是父親怕他死去，向神佛許願得來將他套住，可是卻成爲傳統的枷鎖將之套得無法脫身。

〈社戲〉的敘事者隨母親返回鄉下娘家，透過看戲、評戲、偷豆、煮豆的過程，展現了農家孩子的粗獷、活潑、膽識。童年看社戲的完滿經驗變成了原鄉記憶，伴隨著敘事者，往後長成後「我」在城市裡看戲的不愉快經驗，投射了對原鄉的緬懷。有論者從城鄉對照的角度，指出在五四時的知識分子承受都市文明的迅速膨脹，缺少精神的充足準備，一旦精神受挫，不約而同

魂歸鄉村中的淳厚古樸的人倫關係與道德習俗中尋覓精神的慰藉<sup>36</sup>。可是對傳統疾惡如仇的魯迅未必如此輕易被鄉土的人倫與道德收編，尤其是他在十二歲時祖父周介浮因科場案入獄，他被送往農村外婆家暫住<sup>37</sup>，對農村的生生活有深入的體會，在〈故鄉〉裡就可看出他對鄉土的強烈批判。同樣是鄉土所附予敘事者「原鄉記憶」的故事架構，〈故鄉〉裡的「我」親身闖入「原鄉」，鄉土世界在現實的透視下百孔千瘡、民生凋敝，遂使原鄉破滅。〈社戲〉的敘事者單純以記憶對童年地帶做一番巡禮，反得以保留原鄉記憶。兩篇小說對照下，鄉土的美好只合乎存留於想像中，一經闖入便自我解構。

滿目瘡痍的鄉土，正好與前述魯鎮病重的小孩呈現出畸形的孩童世界，圍繞在他們身邊的人物是由賴皮、看客等構成的庸眾結構，如〈明天〉裡主動來抱寶兒的藍皮阿五趁機佔單四嫂便宜，「從單四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中間，直伸下去，抱去孩子」或是〈藥〉裡的康大叔與茶樓的茶客望著頻頻咳嗽的小栓，直攆蘸了血的包子定能治好小栓的病，可是背後隱藏著這些庸眾的封建迷信與對革命理念的隔閡，瑜兒乃至小栓的死亡並沒有引發任何反省，只有空嘆息的母親追憶亡子。

作者一再讓孩童的失落導因於鋪天蓋地的封建體制，如寶兒服下何仙姑開出的藥方、小栓吃下沾了被處決者的血的包子，我們由此發現魯迅的策略，跟往後三零年代左翼敘述極不同的是他以退為進，並非塑造出會發光的兒童，激進地向封建世界吶喊，指證傳統的弊端，卻是透過「受害」的位置佔據了「被拯救者」的位置，進而反傳統，「面對『死』的終極意義的悲涼，他沒有屈服，沒有沈淪止息，而是選擇了『反抗』的價值。」<sup>38</sup>汪暉確切指出「魯迅『反傳統』的內在動力還不是對某種價值信仰的追求，而是一種更深沈、也更基本的危機感——生存危機。」<sup>39</sup>遊移在生死邊緣，正好讓這些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承擔起打擊傳統的任務。

## (二) 孩童「徬徨」：向庸眾靠攏

---

<sup>36</sup> 有一點需注意的是在歸返鄉土尋找安慰時，卻可能遭受幻滅，如楊澤〈回歸的可能與不可能：是論現代鄉土文學中的土地經驗與社群意識〉便指出知識分子獲得西方知識以啓蒙鄉土、復興國族，卻產生了以鄉土為落後的情形。

<sup>37</sup> 參考〈魯迅年表〉《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北市，海風，一九九二），頁二七九。

<sup>38</sup> 皇甫積慶：〈「死」之解讀——魯迅死亡意識及選擇與傳統文化〉《魯迅研究月刊》，二〇〇〇年第二期，頁二六。

<sup>39</sup> 同注 14，頁六七。

汪暉文中進一步解說「以生存的危機來表達對傳統文化的否定，也即以人與民族的危機狀態這個『果』回溯傳統文化之因，其結果便是在思想方式上將『傳統』作為一種有礙生存的整體結構而予以否定。」

如果《吶喊》的書名預示了對「鐵屋子」這個封閉傳統的吶喊，《徬徨》則顯而易見在整個精神上的逆向轉變。李歐梵曾就此指出：「在《吶喊》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由於響應《新青年》夥伴們的努力而作的樂觀調子，到二〇年代中期，他的戰鬥精神就已消失了許多。正如第二個集子的書名所顯示的，他的情緒已轉向『徬徨』，轉向波動的懷疑和煩惱的哀傷，調子是辛辣而痛苦的反諷。」<sup>40</sup>五四運動後不過數年，當年新文化運動的前驅者發生很大變化，或高升隱退，或從文化領域轉向政治層面的抗爭，《新青年》也走入了歷史，魯迅落得「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戰鬥的意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哪裡呢？」<sup>41</sup>

在抗鬥精神的消退之下，小說裡頻頻出現知識分子、孤獨者在庸眾的圍觀中走向失落或是回歸舊文化系統，如〈孤獨者〉的魏連殳違背自我的原則出任杜師長的顧問、〈在酒樓上〉的呂韋甫從「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走向「敷衍衍衍，模模糊糊的生活態度」；或者是筆調對準於類似〈肥皂〉四銘、〈高老夫子〉高幹亭等假道學或偽知識分子的批判。這似乎取消了知識分子感時憂國的使命感，當〈藥〉裡懷著革命理想的瑜兒、〈狂人日記〉狂喊「救救孩童」的狂人都成了明日黃花，處於「受拯救」位置的孩童要等待誰來挽救呢？

弔詭的是這時期小說裡的小孩走出死亡、病痛的陰影，已不再是病病殃殃，即或是有死者，卻是作為回憶來敘述，如〈孤獨者〉的母親回憶小兄弟的死亡、〈祝福〉裡祥林嫂回憶被狼咬走的小毛，真正出場的小孩免於夭折、病痛，可是卻接受了更嚴苛的考驗，將他們放到庸眾的結構中加以審視。

從《吶喊》開始，魯迅便淋漓盡致地搬演「看客」的心態，如〈阿Q正傳〉與〈藥〉在看殺人砍頭的樂趣中，卻呈現出麻木的神情。作者廿五歲時看一部日俄戰爭的幻燈片時深受刺激，一位體格健壯的中國人被日軍指為俄探，砍頭示眾，圍觀的中國人卻神情麻木，由此棄醫從文的魯迅對看客有諸多批判：

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穀穀，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彷彿頗愉快，人們的犧牲能給予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sup>42</sup>

<sup>40</sup> 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台北，風雲，一九九五），頁七五。

<sup>41</sup> 魯迅：《南腔北調·自選集自序》，同注 4，頁四五五。

<sup>42</sup> 魯迅：《墳·娜拉走後怎樣》，同注 4，頁一六五。

令人驚恐的是到了《徬徨》，孩童大量走入了看客或庸眾的結構中，事實上在《吶喊》集裡的〈孔乙己〉已出現孩童從受害者走向看客的趨向，敘述場景以分成內外座位的酒店為中心，內裡是長衫顧客、而外座是短衣幫，小夥計因樣子長得傻，被分到外面做事，但又做不好，改為專管溫酒的工作。在酒店隱含的階層制中，他連續兩次受到排斥退居於更下階層。魯迅的筆端終究不是在於謳歌孩童的飄零身世，卻用觀看成人的嚴苛標準檢視孩童，呈現出他所欲批判的國民性。孔乙己滿嘴「之乎者也」，被眾人嘲笑調弄。小夥計在面對「掌櫃是一幅凶面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叫人活潑不得」的壓抑中，卻被允許參與嘲笑喝醉酒後醜態百出的孔乙己。當孔乙己要考小孩時，他的直接反應是「討飯一樣的人，也配考我麼？」在眾人圍睹無法適應新社會的舊知識分子孔乙己的悲哀下場，將悲劇消遣成荒謬喜劇時，受到壓制的孩童卻從社會體制接收了同樣的伎倆，赫然走向壓人的體制，在排擠弱者的共犯結構中佔了一席之地。

孩童步入看客群中在《徬徨》裡一再被「發揚光大」，如〈示眾〉在大太陽底下，掀起「看」與「被看」的盛典，事件的中心原是巡警用繩頭綁在一位犯人身上，一群由各社會與年齡階層組成的「看客」團不斷移動進退，以佔據最有利的觀看視角，原本是示眾的犯人卻同時張望著看客，而看客群中也互相張望，最引人注目的是小孩赫然走入了看客群裡，集體陷溺在麻木的狀態中。胖小孩學起眾人「研究著這發亮的禿頭」，卻沒人曉得犯人犯了什麼罪，也沒興趣探索。魯迅激烈批判了國民的愛「看」，即或不明就裡，圍在人群卻能享有樂趣，從犯人的白背心，看到發亮的禿頭、巡警的提腳、老媽子鉤刀般的鞋尖、無所不能看，在層層的對看中，揭示了人群的愚昧、湊熱鬧的心理。小說裡的兩位小孩：賣包子的胖小孩與小學生對「看」的熱切絕對不輸給大人，作者刻意在兩處用了相同的誇張敘述語句來形容兩人：「像用力擲在牆上而反撥過來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飛在馬路那邊了」，飛著似地湊入人群中，鑽來鑽去，尋找有利的視角，其中顯示出更深層的意涵：小孩從「被拯救」的位置走入了「看客」的共犯結構中。

透孩童位置的轉移，我們看到魯迅在架空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時，其實也架空了孩童「被拯救」的位置。如果說拯救／被拯救的關係預設了迫害／受害的前提，當孩童從「吶喊」時期的受害位置出走，拯救者／被拯救者的架構也被瓦解了。由此魯迅不再喊「救救孩子」，反而處處具顯孩童的庸眾特質。〈長明燈〉裡的長明燈象徵傳統痼疾的長明燈，瘋子以為吹熄了「就不會有蝗蟲，不會有豬嘴瘟」。小孩卻走到「迫害者」的位置，加入鎮上代表封建力量的當權派與圍聚在茶館的次團體，聯手欺壓瘋子，把原本屬於拯救者的瘋子禁錮，同時象徵了拯救者／被拯救者關係的解構。

魯迅在〈孤獨者〉裡具體而微地處理這兩者的關係，犀利地寫出兩者如何經由變位走向失落中。不願與世同污、生性怪僻的知識分子魏連役篤信「孩子總是好的。他們全是天真……」、「大人的壞脾氣，在孩子們是沒有的。後來的壞，如你平日所攻擊的壞，那是環境教壞的。原來卻並不壞，天真……，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只在這一點。」他對孩童原抱著很大的希望，將之放到中國未來的想像上，買琴給他們，跟他們玩樂。作者藉由魏連役生活的起落，探觸到孩子骨子裡其實已隱藏著成人的市儈。他被校長辭退，生活慘澹，孩子作為庸眾的結構之一，對之退避三舍。可是當他違反自己的原則出任杜師長的顧問，生活又致富庸眾群又圍繞在旁，「大良們也很喜歡和他玩，一有空，便都到他屋裡去。他也用種種方法逗著完；要他買東西，他就要孩子裝一聲狗叫，或者磕一個響頭。」學狗叫、磕響頭，正是魯迅要批判的國民性，可是卻具顯在孩童的身上，為了玩具、財產，這些孩子步上了成人的後塵，向國民性的卑微探蹟。原本屬於拯救／被拯救的關係卻移位，拯救者被放逐於知識分子的位置，被拯救者走入庸眾群中，顯示出雙重的失落，從知識分子違反自我的原則到孩童沾上敗劣的國民性，當下與未來的國家主人翁偕同走向深淵，令人不得不質問中國的當下與未來有何希望？

如同〈孤獨者〉長者與幼者的架構，〈肥皂〉也著眼於兩者關係，學程在父親四銘淫威的教育下，失去反思的能力，維維諾諾，沒有生命力。他雖處於新式教育體制下，可是似乎沒受到「解放」與「自由」的思潮影響，處處受制於其道貌岸然的假道學父親，由此舊教育與新教育體制的衝突反映在小孩的身上時，搬演了魯迅對傳統的父權世界吞噬童真的理念。小說裡出現一群看客，消遣嘲弄街邊討飯予祖母的孝女。假道學父親與其友人在道德的包裝下模仿起看客對孝女的嘲弄行為，小女孩秀兒與招兒則是以其天性來模仿。這一層層的轉化模仿中，呈現的是從低下階層到（偽）知識分子的「看客」心態，麻痺的是自我的靈魂，在不亦樂乎的模仿中，令我們看到整個共犯結構，無論老少，向下沈淪。

小說裡的孩童從死亡、病痛走向生存，可是卻弔詭地預示了魯迅對孩童希望的破滅。如果說死亡導向被拯救的位置，可是當小孩獲生時卻是走向精神性的死亡，研究魯迅死亡觀的學者將其筆下的死亡分成多種，如「記憶的死亡（忘卻）、情感的死亡（麻木、隔膜）、語言的死亡（沈默）、理解的死亡（寂寞）和意義的死亡（無聊）……精神上的死亡則是一種雖生猶死的狀態。在這個意義上，「活」也就是死，而且是更徹底的死。」<sup>43</sup>如魯迅曾透過狂人喊著「沒有喫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經由「徬徨」時期的〈長明燈〉、〈孤獨者〉、〈示眾〉等向庸眾靠攏的小孩，沒有吃過肉的孩子還有嗎？魯迅批判庸眾精神上的麻木，或是昏睡在鐵屋子中，他誓言向庸

<sup>43</sup> 張箭飛：〈詞語細讀：論魯迅小說中的「死亡」〉《江漢論壇》，二〇〇〇年第四期。

眾宣戰，卻把孩童推向了庸眾的位置，從「吶喊」時期的被拯救位置到如今的宣戰對象，情何可堪？更尷尬的是魯迅在「徬徨」時期似乎不再做未來的夢，不再宣戰。原本作為庸眾的對立者或宣戰者已經移位，如魏連殳與四銘回歸到舊文化系統，小孩則步入庸眾群中，兩者又從對立位走向平行的失落中。

肉體的死亡反而促成甦醒的契機，可是一旦精神步向死亡卻萬劫不復，各類形式的死亡有其繁複的意義，王潤華分析五四小說人物的「狂」和「死」時提到：「……不是純粹生老病死的普通現象，它是五四時代歷史和文學的特殊現象，通過各種形式的狂與死的悲劇，作者提出對中國文化之反思，對傳統之攻擊，對理想未來之徬徨。」<sup>44</sup>孩童從肉體的死亡走向精神上的死亡，正好凸顯了魯迅從「吶喊」到「徬徨」的心路歷程的轉變：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假使尋不出路，就繼續夢好了，萬不

可做將來的夢，切不可喚起許多人來，為將來的希望受苦。<sup>45</sup>

這段談話主要是延續著魯迅當年跟錢玄同「鐵屋子」的爭論，當年他因為「希望在於未來」而抗爭，抗鬥的精神如今已變成頹唐，沈痛地說出「萬不可做將來的夢」。

五四在對「人」的發現中，魯迅小說裡卻由庸眾群構成，「是一群無名無姓、面目混沌、無思想無意識，有時僅只做為小說的背景或人物生存的環境而存在，卻具有令人壓抑甚而至於吃掉『孤獨』『狂人』力量的群體。」<sup>46</sup>如上所述，孩童走入這批張牙舞爪的庸眾群中，令我們關注的是孩童的屬性又再次被轉換。孩童身上寄寓了成人的昏庸、麻木、市儈、殘忍，跟作為體現現代性表徵的孩童的屬性迥然不同。因此在這「徬徨」時期，明顯看到魯迅對孩童屬性的建構已從國民性的重塑逆轉到毀滅性的民族文化寓言。孩童的屬性被召喚到成人的國民劣根性中，如魯迅在一篇文章裡提到：「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裡轉，轉得大了，都昏天暗地的社會上轉，同他們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sup>47</sup>賣包子的小胖與呆在家裡的學程正好可代表這兩類兒童，生長背景不一樣，卻同樣走向庸眾的位置。

<sup>44</sup> 王潤華：〈五四小說人物的「狂」與「死」與反傳統主題〉《魯迅小說新論》（台北，東大，一九九二），頁四八。

<sup>45</sup> 同注 42。

<sup>46</sup> 孫馳：〈作為魯迅小說群體形象的庸眾形象〉《湛江師範學院學報》，二〇〇〇年六月。

<sup>47</sup> 魯迅：《熱風·隨感錄二十五》，同注四，頁二九五。

#### 四 失去孩童：「在」而「不屬於」的童年情境

這批在城鎮、農村擺盪的孩童，或枯槁瘦黃、眼神呆滯步入死亡，或是走入看客群中，若是以魯迅一再強調的「將來是子孫的時代」，很反諷的是他們不讓人見到光明的未來，後者直接成爲「新中國未來記」的終結者。走過五四，站在另一個時間點上，卻讓我們不得不反思魯迅與同時代的作家在引起療救的注意或放棄療救時，是否耗損了兒童的形象？在西方啓蒙思潮影響下，秉持著「幼者本位」的魯迅反對從「成人世界」關照小孩，可是卻一再在小說裡把小孩禁錮於幽暗的文化傳統或徬徨的未來，用犀利的筆鋒挖掘出小孩身上隱含的「國民性」，以死亡、蒼白或市儈、殘忍的面貌來見證這新舊交接的社會。嚴格而言，其筆下的小孩始終被拋棄在孩童的情境外，或是魯鎮的酒店、單親的家庭、跟不上革命步伐的農村，任由封建體制飢腸轆轆地啃噬，完全沒有回歸的機會，只能成爲「異鄉」人，歸返不到童年的情境。失去童稚的他們，接踵步上沒有光明的所在，黑暗中述說著無盡的吃人故事，以其凋零的面貌反映作者對中國未來的憂患。

由此我們可發現兒童處於兩個「現代」之間的矛盾性，一是五四作家在西方現代性的影響下，提倡兒童本位的，關注兒童，另一則是五四作家在反對中國傳統的現代性中，又把兒童當成對抗傳統的工具，以作爲步入現代的手段<sup>48</sup>。這矛盾點促成了「發現兒童」與「失去兒童」同時產生。

魯迅從一開始便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造置於兒童人格、素質、價值觀念更新的基礎上，從對國民性重塑的期待到庸眾特質的注入，孩童的屬性不斷經由成人的想像重構、異化、斷裂。當中無論是「吶喊」或是「徬徨」，孩童始終高高掛在政治的層面上來理解，啓蒙思潮、國族論述如經緯般穿梭其身，可借用梅師家玲對少年的研究來看兒童的屬性：「少年中國」所召喚出的，遂不僅是中西政治文化交會下一時的少年激情，也是百餘年以來，新中國輾轉於救亡圖存之道上的種種血淚滄桑。」<sup>49</sup>兒童群在救亡圖存的理念上展現身段，卻促成了其類型化的形象，共相多於殊相，「幼者本位」下的「個體自我」移位向「集體自我」，進而抹消了孩童作爲生理上的屬性。周蕾在評孩子於教育體制的地位時說：「孩子們再不是——用拉康（Lacan）的心理分析劃分——前象徵幼兒期的一員，他們已是社會主要機制——即阿圖塞所謂的學校是『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參與者。」<sup>50</sup>，周蕾的主要觀點是

<sup>48</sup> 參考朱自強〈兩個現代〉《文藝爭鳴》，二〇〇〇年第三期，頁四六至五二。

<sup>49</sup> 同注 8。

<sup>50</sup> 周蕾：〈男性自戀與國家民族文化——陳凱歌「孩子王」中的主體性〉，收於鄭樹森編《文化批評與華語電影》（台北，麥田，一九九五），頁一〇三。

孩童從生理現象來了解轉換到社會文化、政治的層面，五四的這批小孩當然也不是以「前象徵幼兒期」的生理現象來理解，其涉及到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層面比起周蕾論述的學校要來得更大，是整個政治體制、國家體系、文化系統的參與者。孩童背負著沈重的負擔，從新文化運動過程中負責開拓現代性，批判傳統到往後左翼的建國立民，叫孩子太沈重！

孩童屬性經由政治想像的的建構，讓我們一再看到類似寶兒、小栓、妹子等病死、被吃的受害形象，或是酒店小夥計、大良二良、賣包子的胖小孩等顯露的市儈嘴臉、湊熱鬧心態的迫害形象。無論是受害或迫害，都帶出更深層的意涵，他們圍砌出慘澹的失樂園。「失樂園」呼應的正好是魯迅本身在傳統與未來的時間面上的疏離，他一方面如一般五四知識分子將「社會／文化／政治秩序必須做一個整體而予以否定」<sup>51</sup>，一方面又時而對「自我靈魂的挖掘與對啓蒙本身的拷問」<sup>52</sup>，從而質疑起未來的希望，因此自我放逐於傳統與未來，孩童在他的深沈的焦慮中找不到出口。受害者只能被鎖定在「被拯救」的位置，可是拯救者卻一再缺席，庸眾圍聚一團，在小說中實已構成禁錮的圖像，在這背後又隱藏著魯迅將兒童鎖定在其對中國的過去、未來的焦慮上，構成另一種形式的禁錮。我們看到作者在打破象徵著鐵屋子的「長者本位」時，卻替幼者製造起層層禁錮童真的鐵屋子。孩童屬性的敘述主權完全被成人侵占，其主體性一再被抽離，當他們被推到政治結構中心展現身段時，卻弔詭地被邊緣化或排除於他/她所處之外，形成「在」而「不屬於」<sup>53</sup>的童年狀態。

魯迅把兒童放在被封建文化摧殘的弱者地位或是庸眾群中加以審視，若我們追蹤到往後三十年代的左翼敘述，可更完整看出孩童屬性的轉變。王統照的〈雪後〉抨擊吞噬美好童心的黑暗社會，葉聖陶〈小銅匠〉指控陳舊的教育對兒童人格、個性的抹殺與扭曲，冰心的〈最後的安息日〉童養媳的苦難生活與不幸的命運，如魯迅筆下的一系列孩童，展示於「被害」的位置上。可是卻出現另一批放在「革命」的地位上的孩童，以其激昂的面容向舊有的世界發出挑戰，這一系列從受害的兒童轉化出來，可以吶喊、宣傳口號的孩童，如郭沫若的《一隻手》，童工小普羅等人受到廠方的剝削，組織了全島工人總罷工，推翻資本主義，替左翼敘述立下書寫範本。

孩童的屬性一再置換，從魯迅的孩童的失聲狀態到左翼敘述的「高分貝」吶喊，呈現出被傳統打擊到打擊傳統的趨向，在政治版圖上豎立起英雄碑

<sup>51</sup> 同注 14，頁六四。

<sup>52</sup> 譚桂林：〈魯迅小說啓蒙主題新論〉《魯迅研究月刊》，一九九九年第一期，頁二八。

<sup>53</sup> 汪暉從文化心理結構來看魯迅在新舊社會中「在」而「不屬於」這兩個社會，而本文借用此語指涉其筆下的兒童，雖處在童年狀態，可是卻被推向政治文化的象徵，因此孩童很尷尬地被放逐童年的位置外，不屬於童年，變成「異鄉人」。

塔，看似愈來愈有聲音，其實更遠離了童年的情境。孩童的屬性被建構成革命的范式，在「救亡存國」的主題下，孩童從魯迅小說裡「被拯救」的位置轉換到「拯救者」，其聲音卻愈隱匿，甚至被消音了。無論是默默被吞噬的「失聲」狀態或注入革命的范式，雖然各有其特定的批判對象，這批小孩卻都帶著濃厚的政治理念，放逐於童年情境外，由此五四的發現兒童導致再一次的失去孩童。如果我們觀察毛澤東在延安對魯迅的孩童的詩的詮釋，會更清楚看出這種趨勢：

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裡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說什麼兇惡的敵人我們絕不屈服。「孺子」在這裡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sup>54</sup>

毛澤東對「孺子」的政治性的詮釋，從西方啓蒙主義轉到馬克斯主義的無產階級，更進一步脫離了兒童的生理與心理性，變成一種政治的象喻，「孺子」的所指已經擴大到無產階級與人民大眾，若與共產黨員、革命家、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對比則顯示出如魯迅的「拯救者」與「被拯救者」二元對立的架構，當中牽涉到其權力運作的策略，魯迅將兒童放到「被拯救」的地位，毛澤東則將其政治符碼下的「孺子」放到「被服務」的層次上。兒童的屬性由此在不同的話語體系中不斷轉換與置變。如果說激進如小普羅的兒童，從階級鬥爭對資本主義批判，或者毛澤東的「孺子」經由無產階級理念的抗爭展望未來，孩童在政治上的中心化卻注定了其離心化的悲涼。

當魯迅設法打破傳統的「長者本位」，號召解放孩童，其「救救孩子」的方式與內容令人側目，如前述「理解」、「指導」、「解放」兒童的教育觀是以西方的教育方式為本，以養成孩童耐勞體力、高尚道德、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被譽為「青年導師」的魯迅顯露出其「導師」面貌，替孩童預設了以西方價值為範本的模式。在一片「幼者本位」的主張中，鄭振鐸當時已很銳利看出其中的困境：「在成人的灰色雲霧裡，想重視兒童的天真，寫兒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幾乎是不可能的企圖。」<sup>55</sup>成人在塑造兒童的理想情境時，

<sup>54</sup>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頁八七八。

<sup>55</sup> 鄭振鐸《稻草人·序》，此乃載自葉聖陶《稻草人》之序。

實已將自己的看法附加予兒童身上，文本後隱藏著「救拯者」的角色，尤有思考空間的是符碼的轉變，把孩童從中國傳統的符碼抽離出來，卻馬上置入西方的熔爐裡，這種對孩童的預設是真的發現兒童了嗎？中國的孩童與西方的孩童畢竟有別，當用西方的兒童觀來審視中國兒童時，如廖咸浩所說「把西方的成長經驗予以依樣畫葫蘆，無法真切抓住本土的成長經驗。」<sup>56</sup>廖氏進一步指出西方在現代化的歷程，原先用以支持或挑戰布爾喬亞（bourgeois）<sup>57</sup>的價值在收編／反收編中產生諸多衝突與糾葛，到了五四新文學「在西方布爾喬亞體制的收納與中國知識界的不明究理下，變成了內在毫無衝突與斷裂的西方文化。更重要的是，這些都一股腦兒被挪做『反傳統、反封建』之用。」<sup>58</sup>

追求現代化的五四作家對傳統激烈批判，體現了孩童／未來的不可盼來自於傳統封建的迫害，因為「傳統是『前現代』（pre-modern）的，故必是封建與落伍的」<sup>59</sup>，把所有的責任都歸於封建體制，製造出一群統一形象的孩童，卻無法更進一步爬梳富有歧義的文化傳統，籠統地將古代兒童化約到「成人本位」下，以達到五四作為對過去整體傳統的反叛的目的。這當中忽略了時間的流動性，「過去」與「現在」事實是變動不居，每個朝代「當下」教育兒童的方式的差異性並未獲得區隔，我們若借用熊秉真從社會學研究中中國歷代兒童史的論述便可發現，宋代「入理」與「入情」的幼教模式或清代的「辯體罰、論同情」，<sup>60</sup>與「傳統」的幼教模式有諸多不同之處，魯迅將之視為整體性來批判，卻錯過了從當中的差異性反思、批判的契機。

雖然五四作家時有自我意識，如魯迅認為兒童與成人有別，或周作人批判「專為將來設想，不顧現在兒童生活的需要生活」<sup>61</sup>，但他們用西方啟蒙體系發展出的兒童觀念，對中國「長者本位」的批判與「幼者本位」理論的建構，有諸多可反思的空間。魯迅對孩童的論述如上述圍繞在「童年概念」或「兒童對待」的層面上，背後正好預設了西方近代來對兒童與成人二元對立的特性，衍生出幾個問題，如二元對立的架構背後實已預設了「拯救者」的角色，孩童的主體性已遭否決。另外西方近代的成人／兒童的二元區分的

---

<sup>56</sup> 廖咸浩〈非西方成長（小說）的試煉：在反叛與扎根之間〉《幼獅文藝》，二〇〇〇年六月，頁六九。

<sup>57</sup> 「布爾喬亞」是西方歷史上自文藝復興開始醞釀，到十九世紀全面主宰西方社會的「中產階級」，由於以商業活動起家，價值標準以金錢為本，受到以超越性價值（如宗教價值或人的理性）的信徒的批評，不過布爾喬亞卻促成了商業體系、民主制度等，在西方的現代化中有其正反兩面的價值判斷。

<sup>58</sup> 同注 56，頁六六。

<sup>59</sup> 同注 56，頁六七。

<sup>60</sup> 熊秉真所謂的「入理」是指程朱理學為主的「製造小學」之舉，受智識教育者的年齡大為降低，甚至降低到四、五歲者，將孩童收束在一個新的感化與管理系統。「入情」指關心幼教者對教學內容的反思與改革，以更適合兒童的心理。

<sup>61</sup> 同注 10。

假設是否與中國的兒童觀吻合？熊秉真認為「傳統中國文化以兒童或童年確實有別於成人後成年，但兩者在人生的歷程中呈一互為消長而彼此兼有的狀態……童年與成年並非西方近代文化習慣或心理學概念上所指截然二分的兩階段。」<sup>62</sup>

## 五 結語：叫孩子太沈重

魯迅曾以「摩羅詩人」的榜樣為自許，卻因時代的諸多變動走向失落中。我們從魯迅筆下的孩童切入，也能看到前引李歐梵所論述的「吶喊」到「徬徨」的精神轉變。在《吶喊》集裡，雖然出現一批病痛或死亡的孩童面貌，但是〈狂人日記〉仍然發出「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的悲愴呼聲，正好投射了他對未來的希望；〈故鄉〉雖然在鄉土的幻滅中，卻把希望寄託於下一代：「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或是收入小說集的兩篇自傳式的小品〈鴨的喜劇〉、〈兔與貓〉裡小孩清脆的笑聲躍然紙上、〈社戲〉看到一群不受到封建荼毒的農家小孩；或是〈藥〉裡在瑜兒的墳上添了花環，〈明天〉裡不敘述單四嫂子沒有看到兒子的夢，根據魯迅的說法，他用了曲筆，因「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sup>63</sup>可是到了《徬徨》集卻全是未老已衰的小老人，身上濃縮著魯迅所批判的國民性，〈孤獨者〉大良二良骨子裡的成人市儈、拿著蘆葉片喊「殺」的幼兒，〈示眾〉裡殺氣騰騰的大胖，〈肥皂〉裡學程亦步亦趨於其假道學父親，絲毫不見生命力。「孩童的前程」、「未來必勝於過去」等信念徹底遭到動搖質疑，這時魯迅已不再出現曲筆，鋪陳出悲觀沮喪的基調。這一群全然失落的孩童，勾勒出魯迅對「鐵屋子」理論的深層焦慮：

在這黑暗社會生活著的人們——在這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裡熟

睡的人們有幾個能幸免不被悶死？

這批孩子被魯迅犀利的筆鋒放逐於童年的情境，驅入牢固的鐵屋子內，檢視其走向死亡或衰弱的必然命運。孩子帶有如此大的轉折，其屬性一再被重構，顯示了孩童的發現與失去是一體兩面的。魯迅曾經鼓吹孩童自有其不同於成人世界的孩童世界，可是小說中的小孩卻具顯出「成人的世界」，同時更反映了作者本身精神面向的轉變。當「救救孩子」的吶喊論調在其小說裡行漸遠去，正好可窺探出魯迅對整個新時代的徬徨與精神的失落。

<sup>62</sup> 同注 12，頁三一五。

<sup>63</sup> 魯迅：《吶喊·自序》，同注 4，頁四一八。

在新舊中國的交嬗中，孩童的屬性很明顯地在話語體系的轉變下，從「長者本位」移位向「幼者本位」。同樣的在魯迅個人「吶喊」到「徬徨」時間點的更換中，「幼者本位」也一再移位與斷裂，從國民性的重構到庸眾特質的注入，或是從打倒傳統的鐵屋子到禁錮童真的「鐵屋子」，顯現了 Stuart Hall 所稱「屬性」並非一成不變，隨時代、環境、場域的不同而有所變，乃是與多重異己的敘述（other narratives）互動下形成的，在塑造的過程中受歷史與差異等因素影響<sup>64</sup>。孩童屬性的建構過程中，無論是長者／幼者本位，或是拯救者／被拯救者的架構，都隱然出現權力的位觀，孩子被放到國族運命起落的歷程加以凝視與想像。

站在現代性的分水嶺上，魯迅理應有更好的機會發現兒童，可是「對於救亡圖存的中國人來說，集體的夢想大於個人的夢想」<sup>65</sup>，「兒童本位」非但未得到充分的發揮，卻讓孩童背上國族重擔，如〈風波〉的六斤「一癩一拐」，一路搖搖晃晃走在土場上，走不出傳統黑暗的鐵屋子，更走不出魯迅批判鐵屋子時卻塑造的變相「鐵屋子」，孩童的失落由此可見一斑。

如果我們把觀點設置在往後對孩童的文學批評上，又可見出孩童的另一層失落。當他們粉墨登場於五四時代的舞台上，藉由其童年特質所帶來的政治意涵，擺弄姿態萬千，弔詭的是往後他們卻近乎銷聲匿跡於文學評論中，王德威就此指出：「作家歷來對他們（孩子）的描寫並不算少，但很奇怪的評者的眼光總未及於此。孩子不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麼？在那麼多有關國家論述、男女情色的大塊文章下，缺乏發言權的『主人翁』的所思所行，其實更加值得注意。」<sup>66</sup>信然，孩子的論述應加以重視，尤其在五四時代，看似缺乏發言權的「主人翁」卻往往微言大義、一字千金，其一顰一笑吹皺的何止一池春水，甚至與整個家國休戚與共。行至另一個世紀的關口，回頭遙望上個世紀擺盪於新舊文化交接處的孩童，許多被擱置的論述議題有待開棺重審。

---

<sup>64</sup> 參考 Stuart Hall，黃非虹譯〈最少的自我（Minimal Selves）〉《島嶼邊緣》第八期，頁二四至三一。

<sup>65</sup> 趙明：〈論五四文學傳統的內質與張力——兼論魯迅傳統的斷裂〉《寧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九六年第四期，頁一七。

<sup>66</sup> 王德威：〈典律的生成——小說爾雅三十年〉《台灣現代小說史研討會》（主辦：台北：文建會），頁七。

## 附件

# 現代小說中的孩童論述

## 赴大陸地區出差及研究心得

本計畫由國科會補助，赴大陸進行資料蒐集與短期研究，因主客觀條件需要，曾兩次往訪北京、上海等地，除進行原先計畫所需的資料蒐集工作外，同時也與國內外學者多人交流互動，成果頗豐，茲分述如下：

第一次：

時間：2002年1月17日至1月25日

地點：北京

這次前往北京，主要是到現代文學館及北京的國家圖書館蒐集資料，以及與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夏曉虹、溫儒敏等人會談，討論研究計畫的具體內容與進行方向。現代文學館對於五四以來現代作家的作品收藏頗豐，它以「人」為主體，就個別作家的著作做了很好的整理與收藏。由於本年度計畫以魯迅與周作人為中心，因此對這兩人的相關資料特別留心，補足了若干在台灣不易尋覓的材料。

至於在與陳平原、夏曉虹、溫儒敏三位教授的會談方面，三位精研近現代文學的學者都對本計畫予以肯定與支持，同時表示願意協助提供北大方面的相關圖書資源。他們也提到：大陸方面過去的研究專業分工細密，現代文學與兒童文學研究向來是兩個不同的領域，鮮有匯通。本計畫正本清源，從源起處探析二者間的互動互涉，在研究方向上，頗具開創性與突破性。此外，討論中大家也共同意識到：晚清以迄於五四文學／文化中的「少年」及「孩童」論述，其實同時也關乎到當時文化場域及教育空間的互動變化，因此，如何進一步從當時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以及文化生產、出版體制與生態等方面共同考慮，將可使此一研究更為深化。

第二次：

時間：2002年8月7日至8月25日

地點：上海

由於年初第一次赴北京時，已曾以周氏兄弟為主，就五四前後重要作家的相關資料多所蒐集，因此這次赴上海，主要是在上海圖書館中檢索及閱讀大量報刊資料，一方面注意以往未收入個人文集的散見篇章，另一方面，也進一步了解二〇年代整體的文化生產狀況。所關注的要點包括：各報刊雜誌對於外國童話及兒童文學的翻譯引進狀況、當時學者、作家對於孩童教育的觀念、自身相應的創作實踐等。此外，也關注於當時學校語文教科書的編寫情況，以期從多方面掌握彼時孩童論述的發展實況。

此外，此行同時也會晤了復旦大學的陳思和教授，並與該校的現代文學研究群（包括嚴鋒、孫潔等人）進行會談，對於研究計畫的執行，頗有助益。其間並談及日後雙方研究合作的可能性，同時也擬進行兩校研究生間的交流互訪，促進彼此了解並加強合作。

總結這一年中兩次的赴大陸研究，收穫甚豐。除於研究資料方面，得到許多珍貴資料外，與相關領域學者專家的會談，更有助於研究方向的確立及實際操作。因此，對於進行近現代課題的研究而言，赴大陸短期研究，實有不容取代的重要性。